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

——第三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国际)论文集

蔡先金 张兵 主编



齊魯書社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

——第三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国际)论文集

蔡先金 张兵 主编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 第三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国际)论文集/ 蔡先金, 张兵主编.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3. 12

ISBN 978-7-5333-3022-4

I. ①出… II. ①蔡…②张… III. ①出土文物—文献—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77.04-53
②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6048 号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
——第三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国际)论文集
蔡先金 张兵 主编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7

插 页 3

字 数 561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022-4

定 价 90.00 元

出土上古文学论纲(代序)

蔡先金*

中国文化乃是世界文明的重大组成部分,而中国文学又独占其一。倘若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①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就是构建华夏民族的重要基础元素,从某种角度来说,华夏民族的性格与品质就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呈现,反之亦然;而一部华夏民族史又与中国文学史互为同构,以至于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凯瑟琳(Count Keyserling)高度赞叹:“古代的中国,他们苦心经营,完成最完美的社会形态,犹如一个典型的模范社会……中国创造了为今日人们已知的,最高级的世界文明……中国人高雅的风采,在任何环境里,都是表露无遗。……也可以说,中国人,是所有人类中最有深度的人。”^②中国古代文学具有辉煌的成就,足以彪炳千古,而今出土文学文献屡有发现,愈为之丰富与添彩。地不爱宝,尤其是20世纪以来,出土文献数量之巨,令世人瞠目,几乎每一次发现都会引起学术界震动,于是乎出土文献之研究蔚然成风,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人们喊出了“走出疑古时代”之口号。^③这主要是因为大批资料的出土,尤其是简帛文献的面世,“很多久已亡佚的先秦古书得以重见天日,不少传世的先秦古书有了比传世各本早得多的简帛古本,古书中很多过去无法纠正的错误和无法正确理解的地方得以纠正或正确理解,不少被普遍怀疑为汉以后所伪作的古书得以证明是先秦作品,不少曾被普遍认为作于战国晚期的古书得以证明是战国中期甚至更早的作

* 作者简介:蔡先金,济南大学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② 转引自[美]威尔·杜兰《东方的遗产》,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661~662页。

③ 李学勤最早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参见其著作《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品,先秦古书的体例也被认识得更清楚了。”^①这也恰好验证了王国维的著名的论断:“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②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揭开了商代以及商代文学的一些神秘面纱;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出版,开20世纪简牍研究之先河。近年来,出土文献的相关研究更是方兴未艾。中国古代文学界人士亦纷纷“预流”^③,不甘落后,还发出“改写古代文学史”、“重写古代文学史”的呼声,以期“带动传统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突破性进展”。^④在此背景下,出土上古文学研究理所当然地提到了学界的议事日程。

一、出土上古文学的概念以及形成背景

(一) 出土上古文学概念

在从事课题研究之前,一般应该弄清楚课题涉及的一些必要的概念,否则课题研究就会无从下手,因为研究者缺乏了继续思考的逻辑起点。“建立概念是我们认识世界、处理日常生活的途径,我们掌握和发展概念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获得人和事物的意义,并与他人进行交流。显然,其中有些概念比另外一些概念更加重要。那些关键概念使得我们能够探索各种各样的情境和事件,寻找到有意义的联系。”^⑤弄清楚概念是一件比较恼人的工作,但是我们又绕不过去,必须把这些概念摆出来,正如歌德所言:“杂货虽然五法八门,可以先来看看样本。”^⑥

在中国文学分期中,上古期是指先秦两汉时期,上古文学即指先秦两汉文学。上古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时代,上古文学则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体都在这一时期形成,古代文学的主要特征也在此时期奠定。作为中国文学的孕育、萌芽时期,上古文学自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上古时期

① 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见《中国出土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②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见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页。

③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④ 姚小鸥说:“对出土文献进行认真的研究,有助于文学研究工作者学养的涵育,文学研究界学风的匡正,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前提。”(姚小鸥:《出土文献与21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代序)》,见《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⑤ [澳]科林·马什著,吴刚平、何立群译:《初任教师手册》,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⑥ [德]歌德著,钱春绮译:《歌德诗集(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距今久远,其开端又难以考证,使得这一历史阶段的资料稀少而珍贵,历代学者虽汲汲于上古文学的研究,但仍存在诸多空白。要想填补这些空白,进一步完善上古文学体系,只有依靠于地下所存之上古资料。可以说,上古文学作品与相关参考文献的出土,为上古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提供了新的视角。

出土上古文学是指地下发现的上古时期的文学作品的统称,从载体来看,可以分为卜辞文学、金文文学、简帛文学;从分期来看,可以分为商代文学、西周文学、东周文学、秦代文学、汉代文学;从雅俗来看,可以分为雅文学、俗文学;从文体来看,可以分为神话传说、诗歌、辞赋、散文等。上古文学由此可以划分为出土上古文学与传世上古文学两类。出土上古文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出土上古文学文献和出土上古文学参考文献及其所处的“世界”,出土上古文学文献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出土上古文学作品文献和出土上古文学参考文献。传世上古文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传世文学作品文献和传世上古文学参考文献及其所处的“世界”。通过对出土上古卜辞、金文、简帛中文学作品及参考文献的解读与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文献载体所起到的文学传承作用;通过对诗歌、神话传说、辞赋、散文等上古文学文献的专题研究,我们可以寻绎各类文学类型在上古时代的真实发展脉络。通过对简帛文献中的俗文学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重估上古俗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因此,在整理出土上古文学作品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与研究出土上古文学文献中的文学因素及其文学价值,无疑既有补于传世上古文学的不足,又有利于构建出土上古文学研究的框架体系。

出土上古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世文献材料相对匮乏的上古文学而言,出土文献的价值尤其重大。出土上古文学文献的发现,可以弥补上古文学研究链条上的一些空缺,并为许多悬而未决的上古文学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更重要的是为当下呈现出散佚上千年的不可多得的上古文学作品。虽然出土上古文学还不能全面展现浩瀚悠久的上古文学面貌,但是研究出土上古文学有助于勾勒出上古文学史的又一图景。自殷墟甲骨文出土、敦煌文献重现,至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尹湾汉简、上博楚简、清华简等众多简帛文献的出土,这 100 多年间,出土上古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当代考古成果还将更新许多有关上古文学史的传统观念,还原上古文学的动态发展原貌,从而使完善甚或重写上古文学史成为可能和必要。正因为出土上古文学提供了从本原上考察文学史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所以我们应重视出土上古文学的研究。

(二) 出土上古文学研究形成的背景

出土上古文献与出土上古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出土上古文献是出土上古文学存在的前提。随着 20 世纪初出土上古文献研究的展开,出土上古文学的概念才有得以形成的可能,出土上古文学的研究也才得以形成规模,最终成为了出土上古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上古文献的出土,亦将继续为上古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空间。

然而,出土上古文学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尚古”传统为出土上古文学的研究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在“尚古”这一学术传统的影响下,古代的几次文献出土都为当时的学者所关注。汉武帝时期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出简牍,对经学今古文之争影响深远。晋初汲郡出土简牍,对晋代学术风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一如裘锡圭所言,“从历史上看,我国学者自来都很注意利用考古发现的古抄本和其他古代文字资料来校读传世古籍”^①。正是“尚古”学风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历代学者如此重视出土文献,并逐渐培养起利用出土文献的学术意识。出土上古文学文献是埋在地下没有改动过的相对真实的文学资料,一经出土,便成为文学史界关注的焦点,也必然会促进出土文学的研究。

其次,“二重证据法”为出土上古文学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不仅成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更是出土文献研究的指导理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②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考古材料,并借助考古的最新成果进行出土文学的研究。

再次,出土文献不断涌现在客观上为出土上古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③出土上古文学文献的出现,解决了文学史上众多争论不休的问题。例如,关于唐勒其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④《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然其作品不见流传,关于唐勒的事迹也十分简略。1972年随着银雀山汉墓《唐勒赋》的出土,不仅对研究唐勒其人其辞意义重大,更为宋玉赋公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补充了从屈原楚辞到汉赋转变的关键环节——散体赋这种文学形式。学界对《晏子》、《尉繚子》、《六韬》、《鹖冠子》等上古典籍真伪的质疑,在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后就有了定论。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出土文献不断出现,充实了上古文学研究的内容,为许多上古文学现象找到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如此则较为准确地勾勒出了上古文学发展的原貌。

最后,学界对出土文献研究的多元化趋势推动了出土上古文学的研究。20世纪

① 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②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③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④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91页。

以来,出土文献备受重视,相关研究如火如荼,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史学界、哲学界等都产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随着新出土文献的不断整理和发布,出土文献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文学领域,如李学勤关于《墓主记》的研究、胡平生关于阜阳《诗》简的研究、裘锡圭关于韩朋故事的研究、汤漳平关于屈原《远游》的研究以及大量的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研究。新出的文学史(论)专著同样增添了出土文学研究内容,如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已经注意吸收了出土文学文献的研究成果,赵敏俐、谭家健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单列了“先秦两汉文学与出土文献”章节,赵逵夫主持的《先秦文学编年史》则充分运用出土文献和当代考古成果,解决了许多先秦文学现象的断代问题。当然,与其他学科相比,文学史界对出土文献的重视与研究仍需努力。

在中国文学史上,出土上古文学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以出土上古文学作品文献与出土上古文学参考文献为主要研究内容,旨在以出土上古文学文献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还原上古文学发展的较为真实的面貌。受“尚古”传统的影响,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依靠大量出土的上古文学文献,顺应出土文献研究多元化趋势,出土上古文学研究势不可挡,最终蔚然成风。

二、出土上古文学的类别

(一) 出土上古文献的分类

1. 出土文献的概念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传世之《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宋末元初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叙》中对该词予以界定,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中云:“用‘文献’二字自名其著述,起于宋末元初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文献通考》。《自叙》指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①在传统古典文献学领域,前人在定义文献这一概念的时候便更加关注于其内涵的界定,即指向典籍的记载与宿贤的言论,这亦是词源考稽的结果。^②

①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② 许慎《说文解字·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郑玄《论语》注云:“献,犹贤也。”见《十三经注疏(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6页。朱熹《论语集注》云:“文,典籍也。献,贤也。”见《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页。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云:“过去封建学者们所强调的‘征文考献’,便是说要了解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一方面探索于耆旧言论。”见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电子文献的出现,而今“文献”之定义显露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从国家标准的制度层面予以较为科学的确认,1983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给“文献”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由此定义出发,“文献起源之早,可谓与人类知识萌生同步,而后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之中,乃构成了人类全部知识学重要基础条件之一”^①。然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献”一词还是基于传统定义基础之上的。具体到出土文献,“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②所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本质上应该是互补互证,不能绝对地划分高下优劣。因此,顾名思义,出土文献应是指地下出土的文献。若将其与“出土文物”相混淆就会令人诧异了。出土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即为上古出土文献。

2. 出土上古典文献载体的分类

用来记录文献的物质材料是文献载体。出土上古典文献按文献载体可以分为甲骨卜辞类、金文类、玉石类、简牍类、缙帛类等。

(1) 甲骨卜辞类

甲骨为龟甲和骨的合称,是殷周时期的文献载体。龟甲为龟的腹甲、背甲;骨主要为牛肩胛骨,还有牛头骨、鹿头骨、人头骨、虎骨等。甲骨文一般都是契刻的。这种载体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习俗及物质条件密切相关。

(2) 金文类

殷周时代,青铜器的冶炼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上古时期,青铜器种类很多,有礼器、乐器、食器、饮器、盥洗器、兵器等。这些器物上刻铸的文字总称“铭文”。在青铜器中,乐器以钟见多,礼器以鼎见重,故后世又称其为“钟鼎文”,亦曰“金文”。

(3) 玉石类

春秋战国之际,人们用玉片(玉版)、玉石做文献载体,其优点是精致小巧、易于保藏。大约在春秋初期已出现石上镌刻文字,至秦汉,刻石盛行,因为在石上刻字比在金属器物上铸字简捷容易,并同样可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

(4) 简牍类

竹指竹简,牍指木牍,合称“简牍”。简牍之名,是由竹简和木牍合并简省而来。

① 蔡先金、赵海丽:《电子文献学引论》,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② 蔡敏:《出土文献(以简帛文书为主)的编辑》,参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古籍编辑工作漫谈》,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53~54页。

简是将竹子截筒、剖片制成。许慎《说文解字·竹部》云:“简,牒也,从竹,间声。”故通称“竹简”。又:“牍,书版也,从片,卖声。”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杀青”一事云:“身为竹骨与木皮,杀其青而白乃见,万卷百家,基从此起,其精在于此,而其粗效于障风、护物之间。”“所谓杀青,以斩竹得名,汗青以煮沥得名,简即已成纸名,乃煮竹成简。”^①牍,系锯木削片而成。《说文解字·片部》云:“牍,书版,从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按简,竹为之;牍,木为之。”牍之制作可入律,《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司空》记载:“令县及都官取柳及木柔可用书者,方之以书;无方者乃用版。其县山之多井者,以井缠书;无井者以蒲、蔺以臬繫之。各以其获时多积之。”^②简牍是造纸术出现以前主要的文献载体,书之于竹称为“简”,记之于木谓之“牍”。到了汉代,许慎已经将“简牍”两字混用了,无论是竹质还是木质的书写材料,均可称之为“简”了。《仪礼·聘礼》贾公彦疏:“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春秋左传》孔颖达疏:“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简牍在我国古代纸张还没有发明和广泛应用之前,作为主要的书写载体。简牍或在殷商即已出现,但出土文献显示主要集中于战国至汉、晋时期。东晋以后,纸张基本取代简牍。简牍文献,指的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以竹简和木牍作为载体的文献资料。简牍作为文献载体,较之金石有着取材容易、便于书写的优点。故自有简牍作为文献载体以来,著作较前大增。我国文化奠基时期的著作,大都是写在简牍上的。但用竹木为书写的材料,也有着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分量重、体积大,遇着长篇文字,简策就更多,阅读、收藏、携带都极为不便,弄乱了更不易整理。

(5) 缣帛类

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在竹简木牍流行的同时,出现了另一种文献载体——缣帛。缣帛,是丝织文化之产物,起源于中国。《说文解字·糸部》释缣云:“并丝缣也,从糸,兼声。”《说文解字·巾部》释帛云:“缣也,从巾,白声。”故缣、帛之义与缣同。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写就的典籍,称之为“帛书”。《墨子·明鬼》载“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载“先王寄理于竹帛”。《晏子春秋》亦载“著之于帛,申之以策”。简,常以“册”为数量词,而帛书则用“卷”。丝织品作为文献载体有轻柔、易于卷舒、便于剪裁等优点,但其价格昂贵,亦不便长久保存,故缣帛文献出土相对较少。

(二) 出土上古文学的分类

“文学”一词,从春秋战国至汉,其含义经过广狭多次的变更,略有辩说、文辞、学术、官名、经学等多种含义^③,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后方才指纯文学。出

①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24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

③ 饶宗颐:《战国文学》,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7年第48本第一分册;《澄心论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2页。

土文献中“文学”一词虽然常见,但与传世文献中的“文学”含义相比并无二致。^①“出土文献有各种类型,很多文献都有它们特定的性质和内容。虽然它们都有一定的‘文献’(literature)性质,但是并非所有的出土文献都有‘文学’(belles-letters)意味。”“古人虽然未尝致意于作文,但是发言立意往往有‘文学’意味。”“这就需要对出土文献中的‘文学’性因素进行筛选。说白了,我们需要的是‘文学’(belles-letters)而非‘文献’(literature),因此不能网罗无遗,细大不捐。……我们既然强调‘文学’性,在出土文献中理所应当选择那些带有一定‘文学’色彩的‘美文’为好。”^②

出土上古文学暂且可分为卜辞文学、金文文学、出土上古诗歌、神话传说、辞赋、散文、俗文学。卜辞与金文由于自成体系,暂且单列分类,出土上古诗歌、神话传说、辞赋、散文,暂且按照文体分类,另外,由于还有一些俗文学杂类文献,也暂且单列为一类。

1. 卜辞文学

唐兰最早提出“卜辞文学”一说。^③当代学者也提出了“文章源于卜辞”的观点:“现在所能看到的我国文章的最早形态是一八九八年于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④根据甲骨文发掘、整理、研究的现状,我们必须把我国文章的源头向前推进数百年,承认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章形态。如此看来,“中国文学史应从‘卜辞文学’开始。‘卜辞文学’的确立,将打破中国文学史始于《诗经》的看法,把中国文学史向上追溯六七百年”^⑤。通过卜辞,我们可以从侧面去认识商代文学的面貌,某些卜辞之具有文学性质,这无论是从广义或狭义的角度去理解“文学”一词的含义,都是说得过去的。在商代的卜辞中,不仅有叙事性的记事散文,而且有抒情性的诗歌。从句法结构和文学用语上来分析,“卜辞文学”与《诗经》及其后起的汉乐府等有着血缘关系。^⑥

2. 金文文学

上古金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初样式之一。传统的金文研究大多集中于铜器断代、史实考证、文字释读等方面,着眼于金文的社会、历史方面的价值,而对金文文学价值的关注稍显薄弱。金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文学性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研究金文文学对我们探究上古文学的发端具有重要意义。郭沫若指出:“铭辞之长有几及五

① 参阅赵敏俐、谭家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② 赵敏俐、谭家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398页。

③ 唐兰:《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载《清华学报》1936年第3期。

④ 张寿康主编:《文章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王凯符等编著的《古代文章学概论》和褚斌杰著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都提出类似看法。参阅王凯符等《古代文章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⑤⑥ 萧艾:《中国文学史应从“卜辞文学”始》,载《文摘报》1987年7月22日。

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以器而言固钟鼎盘盂,以铭而言直可称为《周书》之逸篇。”^①

3. 出土上古诗歌

出土上古诗歌包括以下几类:简牍文献中的“逸诗”、称引诗、阜阳汉简《诗经》、敦煌汉简《风雨诗》以及“论诗”的上博简《孔子诗论》。逸诗是指在殷商至战国时期产生的记录在传世文献或出土文献而未见于今本《诗经》的诗之篇、章、句。先秦逸诗的出现有三种原因:“其一,部分逸诗为上古至夏、商时代的作品,或为战国时代的作品。其二,有些逸诗虽然产生于《诗经》时代,却并没有被收入《诗经》之中,它们只是漏收的诗歌,却不是从《诗经》中被删除的作品。其三,确实有部分诗歌原本收入《诗经》之中,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从《诗经》中逸出了,而成了逸诗。”^②所谓“称引诗”,就是称《诗》之篇名,引《诗》之诗句。如郭店简中涉及引《诗》的具体篇目为《缁衣》、《五行》、《唐虞之道》、《语丛三》。上博简中涉及引《诗》的具体篇目为《孔子诗论》、《缁衣》、《民之父母》、《曹沫之陈》、《采风曲目》。阜阳汉简《诗经》有 170 余片,篇目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曹》、《豳》十四国风 65 首残文及《小雅》、《鹿鸣之什》4 首残文。胡平生、韩自强将阜阳汉简《诗经》与今本《诗经》及今已亡佚的鲁、齐、韩三家《诗》做了比勘,认为它不属于鲁、齐、韩、毛中任何一家《诗》的传本,“是否与《元王诗》有关也无从考证”,因此“只好推想它可能是未被《汉志》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外一家”。^③ 阜阳汉简《诗经》自成一家,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上博简《孔子诗论》竹书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种,共有完、残简 29 支,约 1006 字,内容都是有关《诗》的评论。《孔子诗论》的主要诗学思想是崇尚人之真性情,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

4. 出土上古的神话传说

上古神话传说是人类幼稚时代的产物,是先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宝藏。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其中神话传说材料为我们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出土上古的神话传说主要有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记载的创世神话、上博简《子羔》篇记载的感生神话、王家台秦简《归藏》记载的嫦娥神话、睡虎地秦简《日书》记载的牵牛织女神话,以及《夔公盃》、《容成氏》记载的有关大禹的神话传说。《楚帛书》作为迄今见到的唯一的“图”、“文”并茂的有关创世神话的古文献,为我们描述了一幅上古创世神话图景。上博简《子羔》篇是以集群形式记载了上古感生神话。1993 年王家台秦简《归藏·归妹》出土,其中卦辞记载了嫦娥神话的文本雏形,将嫦娥神话的文

① 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5 页。

② 李泽华:《关于先秦时代逸诗的探讨》,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③ 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 页。

本记录年代提前至战国时期^①,既证明了嫦娥神话存在的相对独立性(而非完全依附于羿的神话),又颠覆了我们对于该神话的一些惯常认识(该神话主题并非是对恶的惩罚,反而是对吉美乐生的向往),开启了嫦娥神话独立研究的新时代。嫦娥神话文本经历了一个“层累”的演变过程,最终导致嫦娥之数次“变形”。嫦娥神话表达了不死主题,是在先民月亮崇拜和不死信仰的观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组成该神话的每一个要素都可能被深深地打上了月亮崇拜和不死信仰的烙印。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的睡虎地11号墓出土了秦简《日书》甲种,《日书》为战国晚期的卜筮一类的书籍^②,记载了牵牛织女神话故事的相关资料,价值有三:(1)将牵牛织女婚恋神话的文献记录时间提前到了战国时期,可以肯定的是,其形成时间肯定会早于此。(2)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神话的原初状态:牵牛织女的婚姻是一个悲剧,其原因就在于织女被牵牛多次抛弃,并不像是后世典籍记载和民间口头传说中的对于不朽爱情的讴歌和颂扬。(3)牵牛织女神话衍生于秦文化发祥地。新出土文献《幽公盟》和《容成氏》不仅从不同角度凸显了大禹治水的风貌,而且也为我们研究大禹之德提供了新思路。

5. 出土上古辞赋

出土上古辞赋主要有上博楚简的四赋(《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鹓鹄》)、银雀山汉简《唐勒赋》、阜阳汉简《楚辞》、尹湾汉简《神乌赋》、北大汉简《反淫》等。上博楚简的四赋深具楚辞之风,托物言志,表现了楚人的自然性情。《唐勒赋》的出土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史价值,解决了文学史上宋玉赋是否为伪作的公案,“战国时代不会有散体赋形式的出现,曾是研究者判断宋玉赋真伪问题的论据之一。唐勒赋的发现,则对断定今传宋玉赋的真实性增加了有力的论据”^③。阜阳汉简《楚辞》的出土意义重大,正如阜阳汉简整理组所说:“阜阳汉简《楚辞》虽说仅存下片文只字,但它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2100多年前屈原作品的最早写本。一字千金,十分可贵!”^④廖名春亦指出“屈原的作品是否系汉人伪托的问题随着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片的出土可以说成定论了”^⑤。尹湾汉简《神乌赋》的面世填补了赋体文学传承中的重要一环,也为汉代俗赋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珍贵资料。北大汉简《反淫》的出土,说明西汉时期枚乘的《七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反映了西汉时期散体大赋的发展状况。

6. 出土上古散文

出土上古散文数量最多,按照文献载体的不同可分为金文散文、简牍散文、玉石散

① 戴霖、蔡运章:《秦简〈归妹〉卦辞与“嫦娥奔月”神话》,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

② 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92~295页。

③ 褚斌杰、谭家健主编:《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页。

④ 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楚辞〉》,载《中国韵文学刊》1987年第1期。

⑤ 廖名春:《从唐勒赋的出土论宋玉散体赋的真伪》,载《求索》1991年第4期。

文、缙帛散文。金文散文归入前面的金文文学。简牍散文包括以下几类:(1)战国楚简散文,如《恒先》、《彭祖》、《三德》、《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2)秦简散文,如云梦秦简中的《语书》、《为吏之道》;(3)汉简散文,如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兵法》、《孙臧兵法》、《尉繚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六韬》、《晏子》、《地典》、《十官》、《五议》。玉石散文包括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盟书是古代官方文体源流发展的一个环节。缙帛散文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黄帝四经》、《相马经》等。

7. 出土上古俗文学杂篇

秦简中的俗文学包括放马滩《墓主记》、睡虎地《成相辞》、睡虎地《黑夫惊书》等。放马滩《墓主记》是一篇志怪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丹”的人死而复活的过程。这种志怪故事,“反映了佛教轮回思想传入以前人们对死后情形的宗教信仰”^①,是先民生死观念的体现。睡虎地《成相辞》是一种形式独特的韵文文体,文学样式模式化倾向明显。睡虎地《黑夫惊书》是现存最早的家书,是王翦麾下大秦兵士黑夫和惊的家书,反映了注重孝悌之情的古代家庭观念,这种对于亲情的眷顾和珍惜反映了处于战乱中人们的生命意识。汉简的俗文学包括敦煌简《田章传说》、敦煌简《韩朋故事》、北大汉简《妄稽》等。敦煌简《田章传说》“内容与敦煌写本句道兴《搜神记》、《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等有关,对于研究汉、唐两代的俗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②。敦煌简《韩朋故事》与《搜神记》、敦煌本《韩朋赋》一脉相承。尤其是《韩朋赋》,可能受到过这类作品的影响,《韩朋》残简大概主要是汉代用作讲故事者的底本的。^③北京大学汉简《妄稽》“记录了一个士人家庭内部因妻妾矛盾而引发的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文学性很强,应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篇幅最长的‘古小说’”^④。《妄稽》的发现,证实了西汉时代就已存在篇幅较长、文学性和故事性都相当成熟的世俗题材小说。^⑤

三、出土上古文学的研究意义

出土上古时期的文献资料较之其他传世上古文献资料相对更为可靠,以此为基础可以更为方便和准确地勾勒上古文学发展的原貌。上古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

① 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载《文物》1990年第4期。

② 赵敏俐、谭家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1页。

③ 裘锡圭:《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④ 王庆环:《北京大学收藏珍贵西汉竹书——多项首次面世典籍照亮中华灿烂文明》,载《光明日报》2009年11月6日。

⑤ 朱步冲:《北大汉简——填补历史空白的佚本》,载《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12月11日。

对于上古文学的研究,传统的做法多是从有限的传世史料出发开展研究。大量上古出土文学文献的问世,对重新认识与重新审视上古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崭新的视角。出土上古文学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其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古典文学史研究界提供一个较为系统的新面貌,这将有助于推进上古文学研究工作;可以为进一步充实上古文学史甚至重写上古文学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支撑材料,有助于勾勒出一一种新型的上古文学史图景;可以促使人们重新省视传统文学文献,有助于醇厚当前文学研究界的学风,从而带动传统文学史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总之,积极利用出土文献,是推进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尤其在现实状况下就更值得我们的关注与探究了。

(一) 出土上古文学对于中国文学之贡献

出土上古文学对于中国文学之贡献主要表现在:提供新材料、解决学术公案以及纠正传世文献谬误等方面。出土上古文学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新材料,如甲骨文、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等,都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毋庸置疑的。

1. 为解决学术公案提供了依据

出土上古文学研究可以解决文学史上的一些学术公案。关于乐府何时成立的问题,历史上曾有不同的记载,造成聚讼不断。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只秦代错金甬钟,钟柄上刻有“乐府”二字,这就彻底打破了汉武帝立乐府的说法,秦代已有乐府,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定论。^①关于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为孔子删《诗》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而且还为“诗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孔子与《易》的关系也为学术史上的疑案。宋人欧阳修怀疑《易传》与孔子的关系。到了近代,怀疑者更多,钱穆、李镜池等人都撰文予以说明,认为《论语》中的孔子五十字《易》为不可靠,否认《易传》和孔子的关系。而马王堆帛书《易传》之《系辞》、《二三子》、《易之义》、《要》、《繆和》、《昭力》的出土,使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变得明晰起来了。帛书《易传》为孔子易说,而今本《易传》,虽然有部分后人杂入,但《乾文言》、《坤文言》、《系辞》的主要内容皆为孔子所作,已可以成为定论。^②自从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是后人的伪托之作。如今本《六韬》、《晏子春秋》、《尉繚子》,有人怀疑它们并非《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著作,而是汉代以后的伪作。但在西汉早期的银雀山墓出土了这些书的部分篇章,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同,说明今本应该就是《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先秦古籍。^③今本《孔子家语》一书,世间多以为系魏晋学者王肃伪造。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儒家者言》却与

① 赵敏俐:《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载《文学前沿》2000年第1期。

② 刁生虎:《试论出土文献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载《南都学坛》2001年第2期。

③ 马玉红:《论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补充与纠谬——试析出土文献的价值》,载《文史博览》2005年第6期。

《孔子家语》相合甚多,有的学者推定为《孔子家语》的祖本,从而可能洗脱《孔子家语》的“伪贗”恶名,并重新予以价值评估。^① 今本《文子》跟《淮南子》有大量相同的内容,前人多认为今本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者非一书,乃是后人抄袭《淮南子》等书而成的伪书。从八角廊汉墓所出《文子》残简看,今本虽经后人做过较大改动,但仍保留了不少汉代本的实质性内容,因此并非抄袭《淮南子》等书而成的伪书。^② 很多人怀疑《庄子》杂篇并非战国时期的作品。而阜阳汉简就出现了《则阳》、《让王》、《外物》诸篇文字,张家山汉简也有《盗跖》篇,它们都属《庄子》杂篇。“这些发现证明《庄子》杂篇距庄子不远,它们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作品。”^③《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又有“《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图四卷)”。《吴孙子兵法》即传世《孙子兵法》,《齐孙子兵法》世称《孙臆兵法》。由于《孙臆兵法》失传,它的存在曾长期受到质疑。也有人认为《孙子兵法》为孙臆所作。西汉早期银雀山汉墓《吴孙子》和《齐孙子》同时出土,使上述怀疑之论不攻自破。^④ 上述所论,均充分说明了出土上古文学文献为解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的公案性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证据和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2. 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出土文学文献有助于还原传世文献的原貌,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传世上古典籍,多属汉晋以后流传下来的文本。这些传世文献往往是经过辗转抄写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因此文本中的脱文、错简、衍文、别字等错误在所难免,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其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删改,这就使文献本来的面貌发生了改变。为了避免流传时的错误,尽量保持文本的原貌,人们对古籍做了大量的校勘、整理工作。然而,因所据之本最早的也不过宋代人刊刻,其与上古文学文本之原貌是否相合,并非容易确定之事。

出土文献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其所依据的材料往往更充分、更可靠。其埋入地下时如同打上了历史的封印,不存在被人辗转抄写的可能性,保持着书写时较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为原始的版本。如此一来,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纠正传世文献中的谬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可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根据出土文物来订正人们对古书的误解,其例甚早。如《南史·刘杳传》中记载:

(刘杳)尝于(沈)约坐语及宗庙牺樽,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婆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魏时,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中,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

① 参阅杨昶、陈蔚松等《出土文献探赜》,崇文书局2005年版。

②③ 刁生虎:《试论出土文献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载《南都学坛》2001年第2期。

④ 姚小鸥:《出土文献研究与学术评价的几个问题》,见姚小鸥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也。”约大以为然。

在刘杳、沈约所处的南北朝时期,郑玄的学说被视为“三礼”之学的权威,可是在出土的古器物面前,人们也不得不改正他的说法。出土的古器物是如此,出土的竹简、帛书更是如此。《战国策·赵策四》中有“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的记载。长期以来,误写作“左师触耆愿见太后”。清代学者王念孙曾指出当从《史记》作“触龙言”。这一错误,由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得以纠正。^①《诗经·巧言》第三章“匪其止共,维王之邛”长期存在异解。郑玄《笺》训“邛”为“病”,训“止”为“职事”,人多从之。从郭店楚简《缁衣》篇可知,“邛”为“恐”之借字,“止共”即“止恭”。“臣事君,言其所不能”即“止”,“不辞其所能”即“恭”。而以“言其所不能,不辞其所能”就是“非其止恭”,这正是天子所担忧的,因为臣不臣,则君不君,王焉得不惧?由此可知,以郑玄《笺》为代表的传统说法有问题。^②《老子》河上公注本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二句,河上公注:“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也。”又说:“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顺天任德,敌人自服。”清人俞樾根据唐景龙碑文作“以道作人主者”,认为是古本,又据河上公注中“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也”的话,认为河上公本“亦是‘作’字。若曰‘以道佐人主,则是人臣以道辅佐其主,何言人主以道自辅佐乎?’因‘作’、‘佐’二字相似,又涉注文辅佐字而误耳”(《诸子平议》卷八)。此见解多为人所信从。然而参之出土资料,郭店楚简本《老子》作“差”,亦即“佐”之假借字;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则径作“佐”字。可见景龙碑文、河上公的注及俞樾的理校均为舛误。^③

(二) 出土上古文学文献与传世上古文学文献互补与互证

出土上古文学文献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证据,大大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然而其本身也有各种复杂的情况,不一定十全十美。传世文献虽然有流传上的弊病,但其在文化的传承中大多经过校勘和整理,也有其自身的优点。因此,出土上古文学文献与传世上古文学文献的关系应该是互补互证的。

1. 出土上古文学文献与传世上古文学文献的互补

据《史记》记载,西汉前期黄老之学盛行,此学说是当时决定国家政治的主导思想,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人们的文学作品中就体现出很明显的黄老之学的色彩,如贾谊的《鹏鸟赋》等。然而,由于传世文献的匮乏,对于如此重要的学派,竟无法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既令人产生疑问,也令学术界感到

① 姚小鸥:《出土文献研究与学术评价的几个问题》,见姚小鸥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② 廖名春:《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史的重写》,见姚小鸥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③ 曹道衡:《文物与文献小议》,见姚小鸥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